



【短史记】

古人如何靠智慧度夏

□云韶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伏。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堪称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阶段。而在三伏当中,尤以中伏这段时间最为酷热。好在,身处科技发达时代的我们有冰箱、有空调,有各种制冷设备,凭借科技实力,完全可以将酷热避之门外,因此,今年中伏天虽然较之往年多了十天,人们并没有过多担心。

不过,如果“加长版”中伏放到古代,人们可就没这么惬意了。那时候,既没有电,更没有冰箱、空调、电风扇,这迫使我们的先人想出了无数的“奇思妙想”对抗炎炎夏日。众所周知,夏天想要降温,必须要有降温的工具。如今我们使用的是空调、电风扇,古代人用的则是扇子。

说到扇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扇子被人们称之为“摇风”“凉友”。扇子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的人们在采摘植物叶子或者猎取禽羽后,会进行简单的加工,用来挡住阳光并产生风。到了虞舜时代,严格意义上的扇子出现了,晋崔豹《古今注》云,舜为了“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不过,因为历史太过久远,舜帝时代的扇子并没有保存下来,目前,得以保存的最早的扇子实物是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残件,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篾丝编木制长柄扇。

我们经常在古画上看到的蒲葵扇,据说自东晋开始流行。《晋书·谢安传》中提到某人罢官归里,携带五万蒲葵扇,谢安开始使用,士庶争相模仿,一时间价格大涨。有些富贵人家,还用起了机械风扇。宋代诗人刘子翬的《夏日吟》写道:“君不见长安公侯家,六月不如暑。扇车起长风,冰槛沥寒雨。”“扇车”似乎就是一种机械风扇。

除了扇子之外,古代人的避暑利器还有凉席。在所有的凉席中,最著名的当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的象牙凉席。整幅凉席平整光滑,触感非常清凉,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席子是柔软舒适、伸展自如的,酷暑时躺在上面,就好似拥抱着一块大冰块,想不凉快都难。



乾隆年间的掐丝珐琅冰鉴



清朝绛色纳纱绣佛手花鸟檀柄团扇

众所周知,象牙是非常坚固的,用它来做成柔软的席子,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清代陈元龙所著《格致镜原》中的一段记载还原了象牙凉席的制作方法:“其祖初入朝贡象牙簟,象牙簟者,凡象牙齿之中悉是逐条纵攢于内,用法煮软,牙条逐条抽出之柔软如线,以织为席。”这段话的意思是,制造象牙席之前,需要把象牙先磨成粉状,然后用特定的药水将其软化成丝,最后再用特

殊的工艺和精湛的技术将其编制成席子。

因为象牙凉席太过“奢侈”,为了节约民力,为了让民间不再因为制造这样的凉席而怨声载道,雍正皇帝就亲自下旨不许民间再制造象牙席,正是因为这一命令,象牙席的制造工艺渐渐地失传了。

说完用的,再说说吃的。同现代人一样,古代人在夏天也食用瓜果进行避暑。周密《武林旧事》中提到古代的消暑食物十分丰富,包括新荔枝、军庭李、杨梅、秀莲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林檎、金桃、蜜渍昌元梅、木瓜、豆儿水、荔枝膏、金橘水团、麻饮芥辣、白醪、凉水、冰雪爽口之物等。

光是“凉水”类目,就包括以下诸多细类:甘豆汤、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宋刻作“缩脾”)、梅花酒、香薷饮、五苓大顺散、紫苏饮。

如今我们吃瓜果,往往喜欢在冰箱里冷冻一下,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古人同样明白这一道理,也喜欢将消暑食物冰镇后食用。不同于现代的是,古人没有冰箱,因而无法人工制冰,他们所使用的冰,大多是冬天采集的自然冰。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政府中有专人负责采冰、藏冰、分配和使用冰块,《周礼·天官》称之为凌人。吴自牧的《梦粱录》说:“六月季夏,正当三伏炎暑之时,内殿朝参之际,命翰林司供给冰雪,赐禁卫殿直观从,以解暑气。”酷暑之时,政府会给下属分发冰块降温避暑,这就是古代的“颁冰”和“赐冰”制度。大富人家也常用冰块来消夏,《遵生八笺》称有“杨氏子弟,每以三伏琢冰为山,置于宴席左右,酒酣各有寒色”。

不过,要想吃到冰镇食物,除了有冰之外,还应有盛冰与食物的器具。于是乎,古人发明了冰鉴,有人称之为我国古代的“冰箱”。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曾侯乙墓穴中,就出土了这样一件青铜冰鉴,它的内层呈“回”字形,外层用来装冰块,内层可以用来装酒或者食物,夏天想吃冰镇水果或者冰镇酒,就把冰块放到外层,酒或水果放在内层,吃起来那叫一个冰爽。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工艺和水平的提升,冰鉴也出现了新的样式。明朝官员对冰鉴爱不释手,当时的冰鉴已经发展成由黄花梨或红木制作的箱子形状,雕刻十分精美。到了清朝,冰鉴也被清朝的宫廷贵人们所喜爱,制造出了柏木、陶瓷等不同材质的冰鉴。

最后再说说避暑的场所,在这方面,以皇帝避暑的地方最为讲究。西汉末央官有清凉殿,“中夏含霜,无上清涼”。十六国时期有“温官”和“凉殿”,以备冬夏,“阴阳更迭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唐玄宗有“凉殿”“坐内含冻”等。这其中最有名的当数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

承德位于河北北部,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人迹罕至,景色优美,是避暑驱暑的绝佳去处。避暑山庄的营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开拓湖区、筑洲岛、修堤岸,随之营建宫殿、亭树和宫墙,使避暑山庄初具规模。康熙皇帝选园中佳景以四字为名题写了“三十六景”;第二阶段: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增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乾隆仿其祖父康熙,以三字为名又题了“三十六景”,合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

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时期,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北京以外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

不难看出,虽然古代人没有空调、冰箱,但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夏天也是过得有滋有味。



1955年,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第369窟临摹

【人物志】

常书鸿: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许建立

作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鸣沙山旁、月牙泉畔、莫高窟前,留下了常书鸿坚韧的背影,他以苦行僧般的执着,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西部,将生命之光、学术之辉融入进敦煌之美,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伟大的“敦煌答卷”。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打开地图,东经95度、北纬40度,这个坐标就是敦煌所在。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成为古代中西文化的融合汇聚之地。

2020年6月23日,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离世整整26周年,一本新书同步郑重出版:《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该书再度追忆了这位学者兼艺术家不凡的一生,由著名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创作,是目前市面上比较详尽、完整、可信的常书鸿传记。

叶文玲在后记中写道:“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常书鸿出生于1904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1927年远赴法国学习西画,留法十年,为20世纪中国油画的拓荒之旅写下了精彩篇章。然而,从在巴黎见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那一刻起,常书鸿彻底被感动了,就这样,他便与敦煌结缘,而且再也没有分开过。

1936年,常书鸿离开法国,返回战乱的祖国。1943年,他又几经曲折抵达敦煌莫高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由此开始了对莫高窟有组织、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以当时敦煌的艰苦条件,很多人认为去敦煌从事艺术研究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可是,常书鸿真的去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总感觉有些空洞,只有将心境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下,细节的魅力才会慢慢浮现。

“到敦煌去!到敦煌去!”这是出征号角,也是铮铮誓言,即使在交通条件十分便利的今天,这份执着也令人感动。1942年,常书鸿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为西行敦煌筹集经费,徐悲鸿为展览作序,盛赞常书鸿是“艺坛之雄”。

选择敦煌,是一种历史机遇,这是常书鸿的精神信仰,他相信那里有他梦想的中国艺术。历时一个多月,他终于到了。见到千佛洞、莫高窟的一瞬间。他从骆驼上一跃而下,像个孩子一样奔跑过去,激动得腿一软倒在了地上,眼泪夺眶而出,这一幕像极了回家。

初入敦煌时,常书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一个月来,我们所吃过的苦头全都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死在这里也值!”

由于之前的破败,在敦煌有着做不完的工作。但是,一场家庭变故让他措手不及。由于不顾家和生活的艰苦,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离他而去。敦煌,意味着瑰丽、神秘,抑或是浪漫、悠远,当然,若要享受这一切,首先必须能够忍受静寂、孤独。

“我们在盛夏烈日或严冬风雪中,为了往返城郊,穿越四十里不生寸草的流沙戈壁,一个人在沙漠单调的声息与牲口的足迹中默默计算行程远近的时候……”“这里既然是一个四十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隔绝,日久就会精神上有异常孤寂之感!”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夜深人静时,常书鸿在纸上所流淌出的内心波澜。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文化保护工作进入崭新的阶段。1950年,常书鸿赴京筹备“敦煌文物展”,他明白这次展览的重要意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敦煌工作者的第一次检阅。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在他的灵骨栖地,黑色花岗岩大碑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为之撰写的字:“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

在常书鸿生前,曾有人问他:“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常书鸿的回答再次让人心生敬畏:“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常书鸿的女儿常莎娜从12岁起便随父临摹敦煌壁画,承载父亲遗志,一生亦致力于敦煌艺术教育推广。后来参与了多个中国地标建筑的装饰艺术设计。她说,敦煌一直具有一种征服世界的大美,很多人对它一见钟情,然后魂牵梦萦,钟爱一生。

1983年,常沙娜被任命为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一当就是15年。她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对于敦煌文化,她说:“敦煌壁画的图案太丰富了,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衣食住行中。我一直强调源流,强调我们的文脉。要创新,向外国学习是可以的,但最后要落在我们自己的根上。敦煌就是这样的根脉,它征服过全世界,征服过我父亲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它一直是人类寻找灵感汲取营养的地方。”

“亲爱的爸爸,我终生听着您的教导要弘扬渗透敦煌的文化艺术。今天清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花开敦煌’父女作品展,我们又相见了!”2019年,88岁高龄的常沙娜在以敦煌花卉图案为底纹的签名墙上写下她的心声。

常书鸿去世后,几代莫高窟人接过“敦煌守护者”的使命棒,敦煌文物保护取得了辉煌成就,那些闪耀着艺术光芒的雕塑、壁画,得益于“敦煌守护者”们的巨大付出。

回顾百年敦煌文物保护史,常书鸿仍是最重要、最动人的那一位。有人感叹:在某种程度上,是常书鸿决定了今天敦煌的这般模样。